

绵绵三春晖

白万胜



我的老家位于库布其沙漠南缘,这里风多沙大,严重缺水,是个非常僻远、贫穷、落后的小村子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的父母在多数农民的教育意识比较淡薄、家庭劳动力严重不足、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,汲取他们生命中的能量,倾尽全家财力物力,供我们兄妹六个读书。

我是1971年踏入校门的,到1999年二妹最后一个走出校门,父母供我们兄妹六人念了29年书。其中有19年是供三四个孩子同时念书。如果把把我们六个人的念书时间加起来,总共是念了80年。

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,母亲不识一个字。我们家族可追溯的祖辈也没出过一个读书人。我的曾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,良田百顷,牛羊满圈,骡马成群,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他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个读书的。到了爷爷这代,家道中落。父亲酷爱读书,但爷爷没供他上学,看到同龄的小朋友上学,父亲爱得不行,就蹭书看,时间长了,短不了看人家脸色。稍长,就买了《四角号码字典》和《汉语成语小词典》自学,不管走到哪儿,都随身携带,一有空,就用手指数或柴草棍在地上写写划划。就这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持之以恒,坚持不懈,父亲居然成了本村识字最多、文化最高的农民。直到现在,父亲仍然保持着学习的习惯。看到乡村缺医少药的状况,父亲就发奋学医,立志悬壶济世,对《濒湖脉学》《汤头歌诀》《金匱要略》等艰涩的古文医典烂熟于心。

父亲吃过没有上学的苦头,同时也尝到了学习的甜头,这使他坚定了一个信念:“家有黄金用斗量,不如送子上学堂”,他下决心用知识改变我们的命运,特别是高考政策恢复后,更坚定了父亲把孩子们培养成才的决心和信心。

我们小学就读的学校是达拉特旗原霍亥图公社黄母哈日学校。这是一所村级民办学校,共有一至七七个班,八九个老师,两排土打墙教室。学校在大队(村)革委会所在地,距我们家六七里地。

上小学一年级时,是父亲领我去报名的,和我同时报名的还有我的三妹。当时三妹已经十三岁了,由于是女孩子,本来是不准备供她念书的,但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怕我受人欺负,决定让三妹领着我去念两年。父亲领我见了班主任老师,郑重其事地说:“老师,孩子交给你了,请严加管教!”父亲让我给老师写几个字,我写了“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”,老师面露惊喜,赞赏有加。

我是从五岁开始识字的。那时,丸药的小包装多数是蜡封的圆柱形的纸盒子,父亲就把纸盒子两端的小圆片剪下来,用钢笔写上字,教我识字。这就是我小时候的识字卡片。利用这种卡片,父亲教会了我字母、拼音和几百个汉字。父亲还用掰手指头、移动火柴棍等方法教会了我一百以内的加减法。使我受到了当时多数儿童没有受过的学前教育。

我们小时候,书本资料奇缺,甚至连一张旧报纸都很难找到。父亲便想方设法帮我买书读。尽管一本小人书只有几分或一毛多钱,但对于当时的农民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每次出门,父亲总要设法给我买些课外读物。我记得小人书有《闪闪的红星》《鸡毛信》《地道战》等,小说有《林海雪原》《烈火金刚》等。别人认为这是读“闲书”,影响孩子的学习,父亲却认为开卷有益,拿“闲书”增长我的知识,开阔我的视野。

人民公社时期,西梁外很穷,吃粮靠国家救济,救济粮以玉米面和红薯干为主。我们家人口多却劳力少,生活尤其困难,生产队的几十捆麻籽和奶奶养的六七只母鸡就是主要的经济来源。为了筹集学费,大人领着我们去深秋的库布其沙漠挖蒿秆,或是去初冬的田野上捡麻籽。我上小学时的报名费,就是家里攒了半年的麻绳头、破布条、废骨、废铁、猪鬃凑齐的。我到水井学校读初三的报名费,是父亲背着三十斤麻皮,徒步二十多里,到牛场梁供销社卖了以后筹措的。

上小学时,我连一小块二三分钱的橡皮都买不起,就是拥有一块指头大小的废轮胎当橡皮也如获至宝。铅笔写得握不住了,就用小刀子把笔杆劈开,小心翼翼地取出笔芯,绑在小木棍子上将其写完。作业本正面写课堂作业,背面写家庭作业。当时,一个“田字格”或一个“横格本”八分钱,我们嫌贵,就买四分钱一张的光连纸,裁成三十二开的白抄本,然后扯一张“田字格”或“横格本”纸垫在下面,字就可以写得归行入列了。

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有一天,父亲给大队整理库房,干了一整天,报酬是一顿山药炖饭、一箱半数已使用过的账页纸和报表册。这些即将被扔掉的废纸,被我们做成家庭作业本,让我、三妹和二弟足足阅读了三四年。

小时候,我们一直是趴在炕上或窗台上写字。有一年,父亲让一位亲戚给我做了个杨木小书桌,可把我高兴坏了。再后来,念书的姐妹们多了,父亲去包钢搞副业的时候,向工友借了六块一毛四分钱,给我们买回一个橘红色的炕桌,和杨木小书桌相比,这个桌子宽敞多了,我们把煤油灯放在中间,两个甚至三个人围坐在桌前写字,一不小心就烧了眉毛和头发,有时把煤油灯碰倒,书本上沾满油渍。这个炕桌一直陪伴我们兄妹六人度过了难忘的学生时代。

1979年,我初三毕业,考入了达拉特旗第一中学。当年,霍亥图公社共有两名应届生考入一中,我是其中之一。从我们老家去一中,要大清早动身,走二十多里路到公社所在

地牛场梁,然后花一块二毛钱,坐隔天一班的班车到树林召。那年我已十五岁的人了,本来自己走是没有问题的。但入学报到,父母对我怎么也不放心,思量了很久,父亲还是决定送我。但来回二块四毛车的车费却难住了父亲,最后父子两人背着我的书籍和铺盖,翻越了三十里的库布其沙漠,又步行二十多里路,到了昭君坟公社的所在地城拐,费了很多周折,搭了两次顺车,半夜才到了这一中。

农村孩子进城,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和陌生。为了让在异地他乡有人照应,父亲想方设法打听到了两家远房亲戚,其中一家还在郊外农村。父亲咬牙买了一包纸烟,两毛钱的水果糖作为见面礼,千叮咛、万嘱咐请求亲戚照应我。要亲戚经常给我烙点玉米面饼做干粮,记住斤两,一次还他。父亲又颇为难为情地向那位农村亲戚借了一个很有些年头的、盛炭用的旧木箱给我做储物柜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们家上有老、下有小,正是“拉破窝”的时候。加之父亲有病,不能做苦重营生,全家人所挣的工分连口粮都分不回来,有时还倒欠集体的钱。为了养活全家老小和供我们念书,母亲就拼命地劳动,只要能多挣工分,什么重活累活脏活都干。赶车送粪、剪毛抓绒、犁耩耙磨、锄接收割、叉把连枷、挖渠担坝……母亲样样都是行家里手。由于劳动吃苦,干活踏实,出勤最多,母亲被评为全大队的劳动模范。奖品是一本证书、一把铁锹、一块白毛巾。那块白毛巾,在当时就是一件奢侈品,母亲精心地保存着,好长时间舍不得使用。劳模会是在大队开的,会后每人一碗炖羊肉,糜米饭管饱,母亲只吃了两碗糜米饭,羊肉也没尝,都端回家里,给老人孩子吃了。

有一年秋天防洪,父亲在外地看病,母亲跳进齐腰深的洪水中,和全队社员防了大半夜,不幸落下了妇科病,人瘦得就像个衣服架子,仿佛一阵大风就能刮倒。多亏父亲有见地,当机立断向生产队请了假,牵着外祖父家的一头毛驴,驮着母亲和尚在哺乳的二弟,跋涉五十多里,去了一个叫布尔洞的村子,找了一位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张姓妇科专家,经过二十多天的治疗,才把母亲的病治好。

母亲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,一刻也不闲着。工间休息,别人歇着,她不是做针线,就是扯猪菜,收工回家,也从不空手,不是拎一抱柴,就是割一捆草。

繁重的体力劳动仅仅是母亲工作的一个方面,大量的家务营生更是母亲的重要工作。那时候,我们全家人的衣服、鞋子都是母亲和奶奶手工做的。多少个不眠之夜,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穿针引线;多少晨星寥落的黎明,母亲在瑟瑟寒风中生火做饭。母亲地里家里两不误,两副重担一肩挑。直到现在,我们也无法想象母亲那瘦小的身躯里、羸弱的肩膀上,究竟蕴藏着多大的力量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父亲还会捻羊毛绳、织毛袜子。那时,全家人的毛袜子基本上都是父亲给我们织的。农闲时节,全家人都要帮父亲捻羊毛,父亲把能利用的一切时间利用起来,捻毛绳、织毛袜,放羊的时候都拿着捻毛绳的器具。有一年,父亲去包钢搞副业时,弄回好多旧运输皮带,用钳子剥成几层,给我们做鞋底用,解决了母亲和奶奶粘衬子、纳鞋底的费劲和辛劳。就是那一次,父亲挑了两捆运输带走了十几里地,

竟将两根崭新的竹木扁担压折。后来,生活略有好转,父亲就托在达拉特旗商业局工作的亲戚搞到一个缝纫机指标,买了一台“飞天牌”缝纫机,这可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娶媳妇的“三大件”之一。缝纫机摆在炕上靠窗的地方,油光锃亮,特别显眼,我们突然有了一种奢侈的感觉。缝纫机大大减轻了母亲做针线活的强度,那“哒哒哒……哒哒哒”的声响成了我们生活中美妙的旋律和少年时永恒的记忆。

1980年包产到户以后,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种着七十多亩地,放着三十多只羊。由于土地多劳力少,加之没有任何机械,还是处在老牛烂车吃瘪的时代,春天种不进去,夏天锄不出来,秋天收不回去。父母就起五更,睡半夜,生病了也不敢休息,舍出身子拼命干,一天干别人两天的活。秋天,遇上刮大风,成熟的糜麻果实忽忽簌簌地往下掉,父母急坏了,就白天割糜子,晚上割糜子,一直割到天亮。虎口裂了,手腕肿了,腿也迈不开步了,但还得咬紧牙关苦撑着,羊是和邻居互工放的,和种地比,放羊竟成了父母缓解疲劳的好营生。

由于老家严重缺水,大队或小队经常要搞些截伏流和引洪工程,当时的土方工程都是按人头分到户,完全靠人力开挖的。我们家九口人的工程量,就靠父亲一个人锹挖筐担去完成。月黑风高,不远处就是瘿人的乱坟岗,村民们早已进入了梦乡,父亲还硬着头皮在偌大的工地上孤零零地挥汗如雨,有时,他也担心,也会有一天,他就会累倒在渠壕里,再也爬不起来了!邻居老爷爷关切地对父亲说,供上两个就行了,这么多娃子都念书,把你们累坏呀!

不过,不是所有的劳动都有收获。上世纪之前,老家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。有的年头,老天只记得刮风,不记得下雨,春苗被刮焦,夏苗被旱枯,人们辛苦一年,连吃的也刨闹不下。有的年份,从春到秋滴雨不落,粪堆不散,场门不开,人性口没吃的。遇上这种年景,可就惨了,父亲赶着小骡子车,跋沙涉水,到滩上买草借粮,母亲扛着耙子,到沙原上接灯香、棉蓬,奶奶则住到滩上的姑姑家,捡打草割草,生活更加艰辛。

为了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致中断,父亲想尽了办法。大集体时,父亲给生产队放过牛,到外乡放过倒场羊,到包钢搞过副业。包产到户以后,父亲和母亲养了十多年母猪、公猪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老家连年大旱,父母被迫背井离乡,迁到东沿滩的榆林子乡。人地两生,举目无亲,又经历了我重病缠身、奶奶去世两大不幸,父母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和挫折,但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。因为,子女们明天的幸福,永远是他们不竭的力量源泉!

最不能忘记的是我的奶奶,我们兄妹六个,都是奶奶带母亲拉扯大的,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离开了母亲的乳头,就爬上了奶奶的肩头。奶奶在世时,特别是农忙季节,承担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要家务。柴米油盐,一日三餐;呼天叫小,拉儿抱蛋;打猪喂狗,照料门户,直到去世。多少年来,奶奶穿着老式长大襟红布布半袖衫,腰间带着个针扎儿(自制的针线包),向矮着腰,喘着粗气,终日忙碌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

小时候,我们放学和放假以后都是要参加生产劳动的。一年之中,春耕夏锄秋收冬藏,大人做甚我们做甚。早上是不能睡懒觉的,要早早起来读书或拾粪、担水。从初三三年级开始,我们就离开父母,住校读书,每年春节期间,我们弟兄几个

都要尽可能地多放羊,给父母变工。每年正月初二,就开始筛织子。织子就是糜子、糜子的壳和叶子,细的喂猪,粗的喂羊,一直筛到正月二十左右。筛织子是个体活累活,飞扬的尘土、草屑弄得我们灰头土脸,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每次回学校之前,我们都要帮父母用铡刀铡下至少够喂一个月的马草,把家里的水缸担满。劳动并没有耽误我们的学习,而是使我们学会了许多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,学到了许多课堂上不可能学到的东西。饥饿贫穷、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,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生命的底片上,成为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!

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,我们的孝老爱亲课,是父母在家教的。在我们的记忆中,揭开锅盖的第一碗饭肯定是端给爷爷奶奶的,爷爷奶奶吃的玉米面窝头肯定是掺了白面的,猪排骨、鸡胸脯、羊腩骨肯定在爷爷奶奶的碗里;家里仅有两块褥子是给爷爷奶奶铺的;当头正面永远是爷爷奶奶的座位,这个次序谁也不能改变,谁也不敢改变。每年正月初一大清早,父母都要领着我们男孩子,洗脸净手,点灯焚香,双膝跪地,恭恭敬敬地给爷爷奶奶磕头请安。爷爷是在母亲的怀里永远闭上眼睛的,那一年,母亲才三十二岁。这些无字的大书,永远镌刻在我们的灵魂深处。

包产到户以后,我们家每年的总收入其实很可观,但是绝大部分被我们念书花了,有时候还得向别人借,或向信用社贷。一年一度的乡村物资交流会上,四处飘散着炖羊肉的香味,父亲只是转一转、看一看、闻一闻,从来也没舍得吃一碗,顶多喝一碗羊杂碎。有一次逮住了一种像老鼠又比老鼠大的动物,也叫不上什么名字,父亲馋得不行,居然炖着吃了,腥臊味几天不散。小时候,母亲说自己不爱吃肉,就爱啃干骨头,尤其爱啃我们啃过的干骨头,我们信以为真。长大了,才明白了这个令人泪目的谎言。父母几年也不添置一件新衣服。尤其是母亲,在我的记忆中没穿过几件新衣服,好像天生不爱美。

但只要念书花钱,父母从不吝惜,有求必应。二弟读伊盟师范的时候,想买一套新东方录制的初级英语磁带,共一百元钱。二弟在家信中说了此事,父亲得知后,二话没说,顶着七八级的大风,跑了五十多里路,借钱寄给了二弟。那时,我刚走出校门,月工资三十六块半,这一百元钱相当于我两个半月的工资。那时,我们每次收到父母寄来的汇款单时,不论是五块还是十块,都感到异常沉重,我们知道,这每一分线上,都渗透着父母的血汗。

父母对我们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。那时候,由于交通不便,我们一个学期也不回一次家,写信成了唯一的交流手段,我在这一中念书,父亲怕我想家,每个月都要给我写一封信,问这问那,前安后顿,殷殷之情跃然纸,收到家信真有抵万金的感觉,每次颤微微微地拆开父亲的来信时,看到“吾儿万胜见信如面,别后有久甚为想念”的句子时,我的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了。每年杀下猪的时候,父亲都要带着杀猪炖菜和炒猪肉,坐上班车,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簸一天来看我,并找班主任老师了解我的学习情况。高二那年,爷爷去世,我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之中,学习成绩明显下降。父亲知道后,专程赶来,陪我住了两天,并拜访了班主任老师,嘱托他好好关照我。在班主任老师的开导和鼓励下,我很快振作起来,重新进入学习状态,并在当年考上中专。

记得就是那年,不知道什么原因,快开学了,我还没有收到中专录取通知书,正当我以为名落孙山而心灰意冷的时候,父母抚摸着我的头说,没关系,大大妈妈再供你念,一定要把你供出来。一句话,说得我泪流满面。

苍天不负有心人,父母的付出得到了巨大的回报,我们兄妹六个幸运地全部考上了中专,并由国家统一分配参加了工作,在老家成为美谈。我们兄妹六人之所以能够全部考上,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,但父亲的因人施教、教育得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哪个孩子该念初中,还是高中,哪个孩子该在哪个年级复读一年,夯实基础,父亲都了如指掌,成竹在胸。那个孩子没有考上,不仅不批评指责,而是鼓励打气,继续补习。

父母经过近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,用巨大的自我牺牲,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他们所走过的、全新的人生坦途。由于长期超负荷的体力透支,父亲长年面黄肌瘦,口干腹渴,疲惫不堪,以致经常怀疑自己得了白血病或糖尿病,由于过度负重,疝气两次复发。母亲也在四十八岁那年积劳成疾,患上了高血压、冠心病,在田里收玉米的时候突然晕厥,从此健康状况每况愈下。但父母对他们的付出无怨无悔,对他们取得的成就无比欣慰!

父母之恩,天高地厚;父母之德,山高水长。如今,父母都已进入垂暮之年,母亲由于脑梗变得憨态可掬,父亲也因瘫痪变得跛腿蹇行。想想当年大山一样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父母,我们感到无比心痛。值得欣慰的是,我在即将步入花甲之年,仍能承欢父母膝下,说从前的往事,唱儿时的歌谣,感受父母触手可及的温暖,沐浴父母那绵绵无尽的春晖,感谢天恩!感谢时代!

父母是平凡的,但又是伟大的。但愿流淌在他们血液中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、无私奉献的基因世代传承,滋养后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,披荆斩棘、砥砺前行!

(转载自新华网在线网,文章略有改动)